

解放初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六）

1955年3月29日,甘肃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甘肃省一九五五年安排和改造城市私营商业方案》和《关于贯彻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意见》。4月,银川专区依据中央和甘肃省委的指示,提出了调整私营商业的七条意见,制定了具体工作计划,即:对私商进行统筹安排,对私营零售商使其在可以维持的水平上继续经营,然后逐业加以改造,经过一段时间,使他们逐步过渡为国营商业的分销处、门市部;对于小商、小贩根据自愿的原则,在供销社的领导下,通过建立合作小组、合作社,分担农村流转的任务,并逐步过渡为供销合作社商业;对农村集市允许农民在完成统购任务后,将剩余产品拿到市场自由买卖;对于不在统购统销之列的产品,不加限制。11月,甘肃省商业厅拟定《甘肃省城市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规划(草案)》,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将私人商业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为进入社会主义打下基础。12月,甘肃省委成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五人小组,召开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确定在1956年底以前基本完成对全省私营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1月25日,甘肃省委发出

《关于加快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决定分三步进行:在2月中旬以前完成第一步,发动各行业自动申请;4月底完成第二步,清产核资;第三步进行经济改组和调整商业网点、人事安排等工作。

1956年1月13日,银川地委发出《关于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要求加强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组织领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在银川地区全面展开作出部署。同月,市委和政府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和讨论了银川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问题,并制定《关于银川市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规划》,规定由银川市商业局具体领导,市商业局组织成立“银川市私营工商业改造办公室”。另外,市政府又抽调16名机关干部,会同市工商联及各界代表,以归口公司为主,协助“私改办公室”工作。还举办了训练班,培训299名干部,派到公私合营的工厂和商店中充当公方代表,与合营后的私方管理人员一起管理合营后的工商企业。

开展宣传教育,统一思想认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项复

杂而细致的工作。在公私合营之前需要各方面人员,尤其是要求私方人员及家属的思想统一,认识明确,并要求干部切实掌握好党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使此项工作顺利进行。市委和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精神,按照“私改”规划要求组织商业系统干部和工商界代表,认真学习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向私营工商业中的职工宣传有关政策,号召他们用实际行动积极参加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市妇联、市工会还配合行动,组织工商界家属及私营工商业中的职工,学习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

私营工商业全行业实行全面的公私合营,资本家交出自己经营多年的企业和商店,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场革命面前,不少人因为大势所趋,不得已而为之,但对私有制仍恋恋不舍。虽然政策一再强调要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但他们仍然存在疑虑,怕失掉现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内心矛盾重重。正如毛泽东在《邀集中华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描述

的那样:“犹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甚至有的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心有余痛。”针对这种情况,市委通过统战部、工会、民主建国会、工商联、妇联等组织,采取各种形式,结合银川市几家合营企业的实例(如银川市面粉厂、同福居等),对私营工商业者及其家属,传达毛泽东1955年10月的讲话和党对私营工商业合营中的具体政策,着重说明三个问题:(一)资本家应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二)资本家公私合营是对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社会和国家不会忘记他们所作的贡献。(三)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对资本家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如定息制度,人事的安排(包括家属的安排),一定按中共中央的有关政策执行。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和教

育,经反复讲解政策,多数工商界人士及家属消除了顾虑,领会了党和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方针政策,表示愿意接受公私合营。当时据有关部门调查统计,全市私营商业的饮食、服务、运输等行业中,积极要求合营的约占30%左右,中间的占40%,落后的占30%左右。

(据银川党史网)

华夏独绝奇石山 旅游胜地名在外(三)



奇石(母子欢乐图)。

着军服、头戴军帽、胸佩勋章,井然有序而威严地伫立其间,浩然气场贯通四野。沉寂的四野仿佛在英雄默哀,让他们的灵魂永不消失,精神长留人间。

在民族风情园,刻着哈萨克族、塔吉克族、普米族、苗族、回族等青年男女歌舞的石碑,充满甜蜜柔情而显得爱意盈盈的场景,传递着生命的活力和生活的美好;路旁的一块

小小石碑,上面“情深深”三个红字,温暖安谧,圆满幸福。这里充满生气,栖息木亭上的两只黑喜鹊,被贸然闯入的不速之客蓦然惊起,拖着长长的尾翼缓缓飞离,在附近响亮厉声叫着。

2006年3月,石嘴山市委和政府对其进行综合治理,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以植物造景,汇集全国奇石,取名为中华奇石山。

解放初期清剿土匪斗争(三)

远营出发,沿小路上山到樊家营子一带搜寻。这支队伍刚刚出城,叛变通匪的保安总队宣传队长王鸿钧即派人给土匪送信,让土匪把这支队伍收拾掉。

张信等在樊家营子防卡不远处,发现了曹动之和张永祥的遗体,还有被打死的曹动之的坐骑。在死马处发现有手枪弹壳,在几米远的另一处石头下有步枪和短枪的弹壳。后来抓到凶手曹格丢伦时,他也承认“有一个人功夫很大”。说明曹动之他们是进行了顽强抵抗的。经查验,曹动之胸部中弹,枪眼很小,张永祥头部、胸部多处中弹。现场有撕毁和焚烧文件的痕迹,后经审讯凶手,查明是匪徒烧的。在草中找到《习仲勋同志关于传达三中全会的报告》《宁夏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决议》《朱敏同志在省第一次党代会上的报告》及潘自力、朱敏等对阿拉善旗工作指示的笔记等,还有旗工委组织部公章1枚。杨万山当时没有找到,后来发现被土匪枪杀在另一处树林里。

1950年8月12日,阿拉善旗工委、旗政府为曹动之、张永祥、杨万山举行了2000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西北局发来唁电称:“动之同志为革命事业,多年艰苦奋斗,不幸被匪杀害,实为党与人民的重大损失,全党同志务必提高警惕,坚决肃清土匪,为巩固革命胜利而努力!”宁夏省委为巩固革命发来唁电。1950年11月14日,曹动之的灵柩运回老家安葬,途经银川时,宁夏省党政军民又举行

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西北局为曹动之题的挽词是:“为人民牺牲,模范未来。”宁夏省委的挽词是:“为革命流了最后一滴血,虽死犹荣。”宁夏省政府的挽词是:“为人民事业而牺牲,其功德永垂不朽!”宁夏省委、宁夏军区、阿拉善旗工委及旗政府对曹动之作之了很高的评价。

解放军扬威贺兰山

1949年12月中旬,中共宁夏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宁夏军区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宁夏军区驻宁部队专门召开剿匪工作会议,成立了由独一师师长黄罗斌(后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宁夏军区参谋长牛化东为正副指挥的剿匪指挥部,制定剿匪方案,并对全省剿匪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从12月中旬开始,第一阶段先对宁夏南部山区的土匪及北部李守信两股帮匪进行重点清剿(因当时郭枪子尚未叛乱)。

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经过南部剿匪三战三捷的战斗和连续的追歼,马绍武、李成福、张廷芝、王敬武等匪首被抓捕。李守信、鲍桂庭二匪首逃窜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引渡回国受到了应得惩罚。德王、李守信残匪大部于1950年3月向人民解放军投降,共944人,机枪15挺,冲锋枪22支,步枪、手枪227支,电台6部。其余300余人逃至额济纳旗的马宗山地区被人民解放军歼灭。

在宁夏南部山区与阿拉善地区的剿匪取得了彻底胜利之后,人民解

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于1950年3月向驻宁部队下达了集中兵力围剿郭枪子土匪的命令。

4月初,宁夏军区与十九兵团六十五军合并。军区先后召开了剿匪工作会议和党代表大会,研究制定了剿匪工作必须贯彻“军政兼施”的方针,决定将第一阶段的重点清剿转为全面清剿,以军事打击结合政治争取,并根据匪情划分了任务。以独一师为主负责宁夏南部区,以六十五军一九四师为主负责宁夏北部区。

省政府向各级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队、人民团体颁发6条指示,要求一定要将剿匪斗争作为中心工作去抓,要动员党、政、军、学及文艺、报纸等各方面力量,统一领导,统一步调,互相配合,争取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

六十五军党委研究决定对郭匪进行全面围剿,将贺兰山剿匪区域划为三段,东西段分别由一九三师、一九四师负责,中段由一九五师负责。一九三师五八三团、一九四师五八四团,配属两个骑兵团、一个侦察连,立即开进贺兰山。部队进入贺兰山区后,日夜追剿土匪,一有空隙,就帮助群众翻地、挖渠、灌水。庄稼快成熟时,为防止土匪上山抢粮,就派出流动哨兵和群众一起保卫庄稼。回汉群众感动地说:“我们祖祖辈辈头一回见到这样的好队伍,解放军真好!”这样,民兵和群众一发现匪情,就跑来报告,部队就立即出击,打得土匪无处藏身不敢下山。

(据银川党史网)

移民岁月

第一百一十期

YI MIN SUI YUE

病人的康复是我最大的快乐（三）——记宁夏医学院原院长陈树兰

初中毕业时面临着继续上学还是回家的问题,父亲又对陈树兰说出那句老话:“考不上公立学校就不要上了。”好在她的考试成绩很好,继续读了高中。在读高中时,陈树兰最高兴的一件事是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那天晚上,陈树兰第一次放纵了自己,不做作业、没有回家帮妈妈干家务,而是和同学们一起彻夜游行欢乐。

但不到半年时间,长春又陷入国共双方的拉锯战中,最难熬的要数长春解放前几个月,全城粮食紧张,货币贬值,读书的艰难超乎寻常。1948年秋,长春得到解放,欢迎解放军入城场面热烈而隆重,解放军进城的第一件事是解决城内百姓的生活,很快粮食运到了长春,陈树兰也加入到欢迎解放军入城的队伍中。这时的陈树兰学习更加努力,但生活的困境让她差点与继续读书失之交臂。因家里的负担太重,父亲要让她放弃高中学业,回家帮母亲操持家务。

陈树兰:被迫放弃高中学业后不久,一个同学来我家告诉我:解放军要在长春办一个医科大学,主要是培养解放军自己的医生,最重要的是上学不要钱。父亲听说上学不要钱,就同意我去报考。那时候我高中只读了两年还没毕业,我是拿着原来吉林省立女中发给我的学生证和校徽去报名参加的考试。我记得特别清楚,报名的学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军医大学,没想到的是考试成绩很好,当我听到被录取的消息后特别高兴,一是

有学上了,二是真的不收学费,连生活费也是部队供给,给家里减轻了负担,还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

考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军医大学时陈树兰只有17岁。1948年11月入学。因为是军医大学,还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穿上军装的陈树兰享受了部队的供给制,吃穿用度全是学校配发。入校前,部队招生的老师看她身体较弱,还委婉地问她能不能离开家。她很坚决地说:一切服从学校的规定。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军医大学对陈树兰来讲,不仅完成了她读书的梦想,更成为她人生最重要的转折。

陈树兰:入校后我特别高兴,穿上军装回家,很自豪地给父母声明,你们以后不用管我吃饭了,我能自立了,父母和兄妹也为我高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件很光荣的事情,街坊邻居在向我父母亲祝贺时还嘱咐我:“好好学,以后我们有病去找你。”

考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军医大学不仅圆了陈树兰继续读书的梦,也让她对共产党有了深深的感恩之情。读书的节奏很快,纪律要求特别严,除了上课外,还要每天出操和政治学习、思想教育,学校对学生的组织纪律要求特别严格,一切行动听指挥是绝对的第一位。学校严格管理和教育让陈树兰从心底打牢了为人民服务的基础,成为她今后工作中的行动指南和工作动力。

(蔺银生 撰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银川地区的青年学生运动(下)

(三)宁夏旅平学生会

1929年冬至1930年初,一批从宁夏中学毕业和从西安、兰州转学的宁夏学生纷纷到北平求学。他们为了联络感情,团结同学,探讨桑梓各项建设,建议和督促地方政府更好地治理宁夏,于1930年春正式成立宁夏旅平学生会。他们的宗旨是:宣传科学,反对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推动宁夏的社会进步。宁夏旅平学生会还制定了章程。当时,成员有40余人。在宁夏旅平学生会中,张子华、孙殿才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还秘密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探讨理论,追求革命真理,配合北平地下党组织活动。他们为了促进学习文化知识,交流学术经验,决定创办《银光》刊物,目的在于揭露马氏家族在宁夏的黑暗统治,反映宁夏的社会问题,号召宁夏人民团结起来,为反对黑暗统治而斗争。1931年2月,《银光》第一期出版,《银光》不久后改名为《宁夏曙光》,出版三期后又改名为《塞北》。

《银光》刊物出版后,引起了宁夏统治者的极大不满与恐慌。宁夏省政府派人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控告宁夏旅平学生会是共产党的组织,并抄送宁夏旅平学生会成员名单,要求北平市政府逮捕。1933年,马鸿逵主政宁夏后,一方面明令禁止《银光》刊物在宁夏地区发行,另一方面对宁夏旅平学生会成员进行分化瓦解。刊物也被迫于1936年底停刊。

三、革命火种在银川的延续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银川的青年学生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12月,在新安旅行团的影响下,宁夏省立实验小学的进步教师杨薛云亭、孙芳山、涂春林等人秘密组织成立了“西北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他们制定了国歌、团章、团员守则,还起草了《宣言》及《告西北同胞书》。少战团团章规定,唤起民众,一致抗日,少战团的宗旨是“爱护中华,赶走强盗”,战斗口号是“火线就是战场,战地就是课堂”。少战团团员必须遵守团的纪律,做到“三要”“三不做”“三不怕”。“三要”:一要服从组织决定,二要保守组织秘密,三要忠心耿耿为抗战、为战地服务。“三不做”:一不做亡国贼,二不做汉奸,三不做(日军)顺民。“三不怕”:一不怕苦,二不怕难,三不怕牺牲。

少战团成立后,随着全国抗日

形势的发展,活动逐渐公开,杨文海、薛云亭等教师计划带领少战团员去抗日前线战地宣传慰问,但是这必须得到宁夏省政府的批准。为此,杨文海、薛云亭等教师多次带领少战团团员到马鸿逵公馆请愿,要求赴前线为抗日将士服务。直到1938年1月省政府正式批准,但将“西北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改名为“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只准在宁夏境内活动。

少战团开展抗日宣传的主要形式是办街头壁报和利用集市在街头向群众进行讲演。1938年3月,少战团组织宣传队,由杨文海、涂春林等教师带领,赴平罗、贺兰、宁朔等7县进行了3个月的抗日救亡宣传。7月,又由实验小学校长高立文、教师薛云亭带队,联合宁夏中学宣传队赴平罗、贺兰、石嘴山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几个月的宣传中,少战团员们一路渡黄河,爬沙漠,顶酷暑,走遍全省各主要城镇,大大激发了全省民众的抗日热情。少战团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大大推动了全省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各地以学校为阵地,也纷纷建立了抗日救亡团体。1938年7月,宁夏省党部下令“划一”全省救亡组织,取締少战团,教师杨文海、少数少战团员被迫离开宁夏省城,赴延安参加革命,少战团遂解体。

少战团诞生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时期,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从银北到银南,从城市到农村,广泛、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大大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热情,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培养和输送了一批骨干,在银川乃至宁夏抗日救亡运动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笔。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革命火种在银川青年学生心中延续,大批进步青年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洪流,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青年兴则国家强,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写道:“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于人身。”李大钊号召青年“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青年一代有理想、在历史上,正是一代代青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奋斗,才有了今天的新时代。今天,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也肩负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时代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需要青年肩负重任。

(据银川党史网)